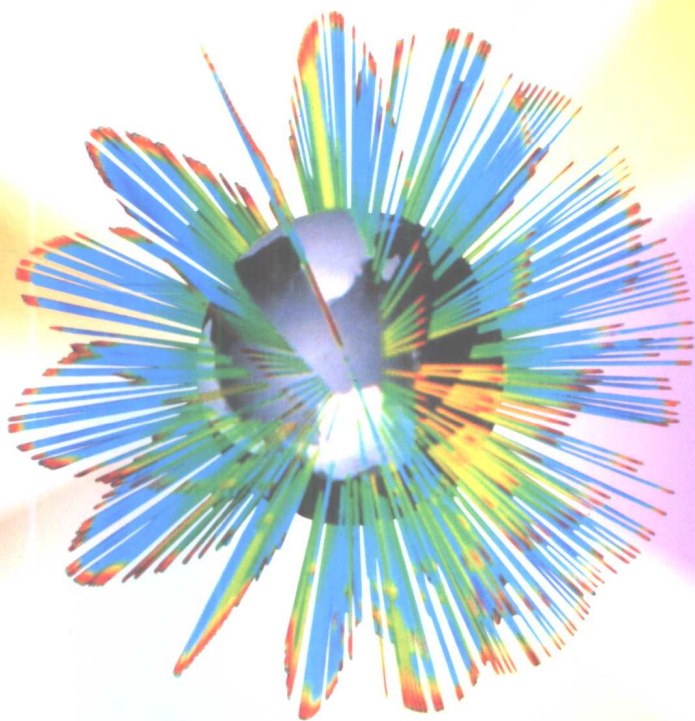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卷

网络社会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 王志弘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信息时代三部曲：
经济、社会与文化

第一卷

网络社会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曼纽尔·卡斯特 著 夏铸九 王志弘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社会的崛起/曼纽尔·卡斯特著,夏铸九等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ISBN 7-80149-532-2

I. 网… II. ①曼…②夏… III. 信息技术-社会影响-研究 IV. G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569 号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

网络社会的崛起

著 者:曼纽尔·卡斯特
译 者:夏铸九 王志弘 等
总 策 划:薛晓源
责任编辑:程晓燕 杨雁斌
责任校对:闫晓琦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21.25

字 数:531 千字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532-2/F·159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 Manuel Castells 2000

英国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授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中文简体字独家专用权。本书根据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年版译出。

翻译分工说明

1996 年版翻译分工

总导言：夏铸九，第一章：殷宝宁，第二章：王志弘、魏庆嘉，第三章：黄丽玲，第四章：殷宝宁、温蓓章，第五章：殷宝宁，第六章：王志弘，第七章：王志弘，结论：夏铸九，
校阅：殷宝宁、夏铸九、林秀姿、戴伯芬

2000 年版翻译分工

第一、四章新增部分：谢幸燕

第二、三章新增部分：苏子尧、钟玉玲、余佳玲、李延辉、
王志弘

第五、六、七章新增部分：王志弘

新增图表部分：陈朝全

总校阅：王志弘、夏铸九

献给艾玛·基斯尤娃-卡斯特 (Emma
Kiselyova-Castells)，没有她的爱、劳作与
支持，本书将不可能面世。

信息化社会与认同的运动

——中文版译者序

正宗小说起源于 18 世纪，红于 19 世纪，对 20 世纪的小说家来说本已太迟。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斯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 70 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 70 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以挽回小说的颓局。

——李敖，《北京法源寺》，第 366 页，2000 年
(重点为作者所加)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UNDP) 出版的《1999 年人文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的封面使人心惊。封面里说明其外圈为世界人口，扇型派分为各区域，中央暗色楔形显示为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 (Internet)^① 使用者。它显示传播与

① “network” 本书译为网络，译名需兼顾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之双重要求，以及更广泛地考虑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中国内地等地之使用。我们再三讨论的结论是，放弃目前台湾地区通用的“网路”译法。译者觉得需顾及社会科学的概念，甚至，我们还怀疑早年台湾信息科学界翻译此词时对网络的理解过于简单。其实，就信息技术之范型而言，“经络”之“络”比“路网”与“线路”之“路”复杂，而且既考虑到中国文化土壤的因素，容易了解，也传神得多。因此，除了 Internet, World Wide Web 等专有词，使用既有译名外，对 network, net 等均译为“网络”。



沟通的技术整合趋势，也形象地显示了全球化下的不均匀性。互联网正在新的全球网络中联系世人，但是通路却集中于富裕国家的人们之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占世界人口的 19%，但却占使用者的 91%。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醒我们：“地理障碍可能已为传播与沟通所减低，但是新的障碍已经浮现，像普及全球的信息网，允诺连接，却寂静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排除了其余的人。”

若我们进一步审视资料（至 1998 年年中），可以发现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4.7%，但是却占了互联网使用人口的 26.3%。整个东亚，人口占 22.2%，使用人口却只有 0.4%。再往前一步看，有些国家的使用人口比美国还高，像北欧的冰岛（接近 40%）、瑞典（30%）与芬兰等。东亚的新加坡成果最出色（超过 20%）。有些国家也以有创意的方式使用与推广互联网。埃及开始推动技术通路之社区中心，让更多的个人、民间团体、小企业、低收入社区等在公共建筑物与地方商会中接近互联网。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虽小，却积极使其上网人口高于法国与意大利，而且，他们将互联网作为学习的工具，而不是用于玩电子游戏。印度则通过人造卫星与太阳能充电的电脑来使偏远村落接触信息技术、教育与医疗服务。^①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中潜藏的更深问题还不是接近通路，而是使用的内容与质量。这关系到我们对这个全球化与新技术挑战的认识，因此我们贡献此书以为知识的桥梁。

我们很荣幸能把我从前的老师，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教授的新书《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译为中

① 以上资料参考联合国发展计划出版署（UNDP）的《1999 年人文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New Y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63~64.

文。《信息时代三部曲》之第一卷为《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1996），第二卷为《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1997），第三卷为《千年的终结》（*End of Millennium*）（1998）。本书逐年由英国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卷曾为了回应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而于1999年再版修订过亚太区域那一章。为了争取出版之时效，本书第一卷的1996年版翻译时，我组织了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优秀的博士班研究生分工翻译（译者分工见版权页）。但是等到本书第二、三卷翻译行将结束时，卡斯特又决定修订原第一、二卷与2000年版一并再版发行。因此，我们决定中译本的出版时间不多让于英文版，一步到位。目前读者所见的译本，都是依据2000年的最新版本译出的。曼纽尔·卡斯特嘱我写译者序，可是目的不在于介绍作者，而是将本书结合华人社会。

我们希望与华人读者分享对21世纪世界性趋势的学术性分析，共同迎接所有华人社会进入新世纪后的挑战。本书不是未来学，它分析的是正在浮现的新社会结构。作者尝试概念化此社会结构为**网络社会**。阿兰·图尔纳（Alain Touraine）称誉本书将成为21世纪的经典。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出版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书评中推崇本书之于信息化社会，有如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之于工业社会。吉登斯甚至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应是社会科学更新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科学崛起于工业秩序创造的巨变中，它来自西欧封建社会的废墟。而今天，巨变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再度来临。信息时代的特征正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我们曾经看过，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在启蒙主义的光辉中耸立，而现在，现代性的神圣光环却在影像与信息的全球流动中变换成为疑幻似真的



符码。面对前景晦暗不明的新世纪，我们确知不能再延用过时的昨日范畴来看待世界，不然，政策、方案、行动均将羁绊不前。可是，话说回来，此时“我们”本身，不也正是现实之症候之一吗？破除华人社会自己既有历史成见的关键在于学习掌握形势所必需的知识。

与全球经济形构互动的新技术力量是**信息技术范型**。这个在70年代美国加州硅谷出现的信息技术革命，包括了数字化的生物科技，并非单向地由社会所决定，而是由技术本身所引发的。然而，它一旦成为系统，其内容则为发展的历史脉络所决定。1990年后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70年代的技术革命已被当作资本主义模型转化的积极力量，新科技之高生产力也伴随产生了弹性化的工作与不稳定的生产关系。信息科技催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它不但显示了组织网络之重要性和劳动个人化的趋势，也在转化时间与空间。跨国资本快速巨幅移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正在转化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电子多媒体也正在把我们分化为“互动的”与“被互动的”两种人口，前者能参与主动创新，后者则被动接受信息。在历史剧变之中，流动空间并非简单地消灭了地方空间：**转化的过程才是关键**。例如，零售业承受电子商务庞大的冲击，但是它并未消失，而是被迫转化为交换与消费的形式。譬如书店就是最值得观察的对象。当亚马逊（Amazon.com）这样的网上虚拟书店兴起时，在城市里密集的书店街衰退了，有些有文化历史意义的书店会被指定为城市历史的地标（像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避免被破坏。然而，有些表现出特殊的空间与文化风味的新实体书店，也竟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大潮中，有机会成为改变城市中心空间氛围的重要元素，设计师在都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上获得了全新的表演舞台。甚至书籍生产在试探电子读物或是现订现印的速成书市场的可能性之时，书籍本身的文化形式竟也有可能被设计得更细致，升级为

仿手工的产品，甚至在翻页时都能触动阅读者的身体与所有感官。这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政治过程。有些社会行动者们逐利，更加注重货币起伏的价值；有些却更信赖对原初团体的认同，并借以挖掘抵抗的战壕。贪婪的投机与狂飙的抵抗让赌徒与暴民成为同台演员，不劳而获竟然明目张胆地成为政治经济结合的筹码。然而，积极而深沉的社会行动者必须了解正在转化中的社会并且认识新技术的巨大力量。流动空间的基础化（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是历史与技术的挑战。历史与社会中从来就没有宿命论者发言的空间。这个**全球转化**的过程是最值得我们探索的环节，历史的结局仍未可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与各区域发展消长的趋势中**亚太经济的变化**。从1960年开始，尤其是1980年之后，东亚整体区域的收入增长惊人，当然，还必须包括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及其以后的艰难复苏。这种历史性的不寻常经济表现和技术升级强力跳跃造成了脱胎换骨的动力与机会，亚太地区作为新的全球制造中心正在崛起。这种新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转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与多样化，使传统区域与国家间的南北对抗失去了分析现实的意义。这种趋势也改变了全球资本与华人资本的投资走向，彻底地改变了东亚以至于世界华人社会的相互关系。然而，若对世界市场中的亚洲贸易模式与跨国生产作进一步考察，我们会看到日本与其余亚洲国家间战后长期的商业与技术的双重依赖性。亚洲其他国家从全球经济中，特别是从与美国贸易所获的出口贸易剩余中来承担对日的人超，这种区域的依赖关系并未因亚洲的经济增长而改变。换句话说，亚太地区甚至亚洲作为一个有经济自主性的区域，至今并不存在。我们只有一个为全球经济所贯穿，在国际分工中有制造业活力的快速发展的亚洲，亚洲经济危机则是更进一步将亚洲纳入全球经济之中。当然，中国与印度未来的发展将有利于增加亚洲贸易本身的多重性。目前，前述的新经济与新技术正是深化技术依赖的核

心。大部分的东亚经济体，国家与企业，或有前有后，均不得不倾全力提高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提高生产力，试图拉近与美日间技术依赖的差距。于是技术创新的能力将决定我们在下个世纪之命运，这又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能创造性地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将全球与地方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作为新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基地，在东亚这种快速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创造性破坏”的灰烬里，伴随着阶级的两极分化、环境意识抬头、地域意识复兴与认同关系的改变，新的社会动力正在出现。过去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也演变成更复杂的全球化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层复杂关系。华人社会，包括近代散居海内外的侨社（Chinese Diaspora，或overseas Chinese），都被迫必须用新的范畴来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必须思考华人社会与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经济活动、文化特征与政治转变，甚至想像可能的网络社会所支持的特殊图景。同样，面对当前快速而多重向度的变迁和结构性的社会与历史转化，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的范畴已经失去分析现实的能力，我们需要知道历史的时势，因为历史正在翻页。我们需要有历史感，因为除了我们的历史感之外，别无其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正是这个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崛起后的第一次警钟，我们可以预期一个开放的亚洲，但也是一个更脆弱的、更多冲突的世界。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改变了战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原是亚洲华人政治与社会自觉与不自觉模仿的对象与参考的坐标。我们已经见到了既有的国家制度性角色的改变。浮现于30年代顽强的劳工运动压力中的福利国家已被放弃。当福利国家让位于公共空间私人化之后，相对地，作为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时代制度上一体两面的对立体，市民社会的自主性竟遭破坏。当福利国家社会再分配的机制被破坏时，我们见到了社会骚乱与认同运动的烽火。这三卷书中一以贯之的红线正在于两股力量的交汇：前面提到的信息技术

范型，以及另一股社会运动认同力量的牵制。它们构成了新社会浮现的基本张力。可是，这种社区共同体的抵抗已不同于过去的时代所相信的现代市民认同。社会运动仍在，然而我们看见运动的片断化、地方化、单一议题退缩于内在世界之中，或短暂突显、纠缠在认同政治的内在情结之中……此时，更需要对运动进行分析而非教条认同。以此为基础，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才有机会提高到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重新建构社会转化所需的主体性。历史感无进步与退步之分，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我们只有勇敢面对这个社会结构。我们看见历史的尴尬，自由主义者取得的民主制度竟然使人充满了失落感。国家主权与议会代表制度双双动摇。前者终为全球经济所贯穿，而议会代表制所表现的间接民主制度已为大众媒体所表现的象征政治所扭曲，扩大了形式民主的内在弊病。当当选总统如同像进入超级市场选购商品一样时，有些人以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统了，但是，真实的决策却比以往更加隐而不显，暗自控制在更遥远的精英手中。对经历了漫漫长夜的第三世界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黎明的情景更是情何以堪。在信息流动中的后现代符号政治嘲讽地对他们扮了一个历史的鬼脸。

当民族国家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之全球化过程中历史地转化时，国家仍然存在，然而，国家的新形式与社会的新形式也必须重新开始摸索。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压力之下，在城市国家（city-state）与市民社会的历史土壤之上，欧洲分享了统一的经济体，跨过了欧洲原先民族国家既有的固定疆界，却并未产生具有民族国家意义的、完全的欧洲国家，它们有意避免复制世界上已有的联邦国家的国家中心与中央政府权力。于是，浮现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之制度，而文化上的欧洲认同被期望成为联系政治与经济建构正当性之计划。另一方面，当区域经济愈益全球化，当巨型城市连接了全球经济，扣接了信息网络，集中了世界的权力时，巨型城市却承担着不均等发



展的空间结果，它既是空间的片断（fragments），也是功能与社会的碎片与区段（segments）所形成的非连续体。这也就是说，在进入网络社会时，是什么人进入网络，有权力描绘地图？面对全球化与推动它的新技术，确实需要更开阔的治理体系（broaden governance），而不只限于过去的政府（government）角色。因此，摸索领域治理体系（territorial governance）重构之政治新视野，既需要能结合区域发展和有自主性的社会活力（包括企业组织与非盈利组织），又要能调和既有的各国中央政府应变迟钝与诸多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缺陷。今日，当亚太区域的发展性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历史性的组织角色已逐渐释尽其功能时，面对新世界形势的快速变化造成的国家竞争力降低与民族国家角色弱化，如何能放手让区域与地方政府面对新的结构性角色的挑战呢？地方的治理体系（local governance）如何才够敏感，回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过程中已经初步自我授权了的（empowered）人民的需要呢？举例而言，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化城市（De Digitale Stad, The Digital City）计划得到 70 年代违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分子的推动和市府支持，未商业化却提高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参与与市民自主性。再例如，加州硅谷区域与新竹—台北区域间信息、技术、资金、人才流动的网络是思考全球信息化过程有利的技术学习起点。^① 甚至已经全球化了的台湾，其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正是来自这个加州硅谷—中国台北新竹—中国内地沿海全球巨型城市（global megacities）间之连接性，即电子工业之国际化生产网络。^② 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新关系却要如何调适呢？立足在东亚都市史

① 参考安娜李·萨克西尼安对硅谷新移民企业家的研究，见 Saxenian, Anna Lee (1999)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② 参考夏铸九 (2000): 《全球经济中之跨界资本——台湾电子工业之生产网络》，《台湾社会研究》（将出版）。

的遗产之上，近年来东亚国际贸易发展似乎开拓了城市国家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有无智慧与视野大步跨越亚太区域纠结着的大战与内战的伤痛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历史阴影，想像网络国家的潜力呢？对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竞争而言，企业与国家的组织角色重要，国家则尤为关键。古代中国技术优势丧失活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弹性的政体的保守官僚。儒家的独占性政治伦理、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和皇权的一统性，对比于欧洲之自主性地域、彼此共享的文化与相互竞争，使我们自明代起即逐渐失去了技术的优势。在过去的欧洲，不但历史地形成了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动力，而且成就了现代科学，以及建构了在今日已颇受质疑的所谓社会理性认知的能力。从世界史角度被迫对比之余，我们坦然承认技不如人。经历了数百年之迟滞，由改革到革命，由变法图强到激烈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再度面对新的历史的转折点，却必须面对一个新技术要再度领先我们的时代。由毛笔书法寄情不朽，经历铅笔、钢笔与圆珠笔到今天之电脑输入，这不止是书写工具之更新，更说明了网络社会的浮现：符号已经是生产力本身，心智与机器、象征与技术也有重新互动的机会了。然而此时，英语已经强势地在作为世界工具语言的形势下催逼人们拼命向前，我们岂敢落后？再进一步，这个全球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网络了，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而且是一种多重面向的虚拟的文化。面对全球经济之多变几何形式，华人社会政治领域之城际网络（intercity networking）角色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信息流动中，在全球化的城市与区域将会是各地域未来的内缩自卫的战斗城堡吗？还是全球化与流动化过程中来往传递信息的虚拟桥梁与节点？本书英文版第三卷的封面，即 19 世纪中叶俄国画家列宾（I.E.Repin）的伏尔加纤夫图表现出对穷苦农民的深情，穿越时空，在为不均衡发展及数字鸿沟所困扰的现在仍然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华人社会集体记忆中的悲惨现实生活所



衍生的忧患意识与对“经世济民”之学的渴望，在贫穷、压迫与兵灾之中很难感受到基督教文化预言千禧年的太平盛世，恍若来世般的虚幻宗教幸福感。尤其是在新全球经济的金融市场中，由信息网络中获得了自己生命的资本之流，不但左右了我们现实经济的命运，而且，它们还创造了一个更向钱看的单一价值，一个更以钱滚钱、投机与赌博的世界。

毕竟，亚洲已经不是过去被世界理解的边陲之地，华人社会也不仅止于被世界视为是两极化区域中新富之碎片与区段，更不能被种族主义者之成见视为天生赌徒之乡。若我们不妄自菲薄，那么，我们要如何插手塑造这个全球转化的过程呢？历史岂会终结？我们亟需开放的心胸与有智慧的新视野在全球转化的过程中赋予我们的社会与历史、空间与时间以想像力的新意义，而非自限于历史的锁链，或沉溺于任何类型基本教义的认同情绪。我们只有开放自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信息，这是饱经战乱与辛酸的近代华人趋吉避凶之道。或许这样，因经济发展而刚浮现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摸索新形式，才有机会催动新政治，而信息化城市（informational city）才有机会成为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y），提前在东亚来临。鱼沉水底，鲟鱼逆流而上，然而它需要懂得乘势；鹰击长空，鹭眼鸟瞰，为的是回应地面的具体细微动态。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全球系统中的这个已经来临的新社会。

最后，由于出版社之要求，不重复本书封底之介绍，^① 将我认识的曼纽尔·卡斯特教授略作补充介绍。

卡斯特与一般西方的学院学者不同。他的博学由此三卷书可

① 对卡斯特思想介绍与分析的其他中文资料可以参考：夏铸九（1992）：《理论建筑》，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2，唐山，第217～221页。卡氏著作等身，部分文献之中译可见：夏铸九、王志弘编译（1991）：《社会理论与空间的文化形式读本》，台北：明文。

见一二。然其博学与其说是来自不寻常的学历,^①不如说是因为他投身于社会运动,因政治放逐而开始了他在世界各区域进行田野研究与讲学的知识旅程。卡斯特原本出身巴塞罗那的贵族,却与他的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投身于反抗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社会运动。结果,在20岁那年因政治放逐而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在流亡巴黎的岁月仍然参与运动,除了读书,也是巴黎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1965~1967)。卡斯特是阿兰·图尔纳的学生,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好友。1968年五月运动时,卡斯特正是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社会学的助理教授(1967~1969年)。结果再度被放逐,只得转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社会学助理教授(1969~1970年),也于此前后参与了智利阿连德社会主义政府时期的都市研究工作(1968年与1970年)。1970年起,卡斯特任巴黎的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②社会学副教授以及都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

一直到1979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因为老成凋谢,亟欲物色能成一家之言的学者,保持学院于世界的领先角色,于是,同时从法、英两国分别挑选了曼纽尔·卡斯特与彼得·霍尔(Peter Hall)。自此,离开了欧洲社会的土壤,卡斯特才真正转换了航道,成为完全的学院研究者。若要求学究

① 卡斯特曾就读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系(1958~1962年),获巴黎大学公法与政治经济学文凭(1964年),巴黎大学劳动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劳动社会学文凭(硕士,1965年),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PHE)社会学深入研究文凭(硕士后,博士先修班,1966年),以及分别以不同的论文获得1967年巴黎大学社会学第三阶段博士、马德里大学社会学博士、巴黎第五大学(索邦)人文科学国家博士。

② 即原先之高等实践学院(EPHE),1974年才在法国官方高等教育系统内得到国家认可,1975年成为独立的高等社会科学院。